



江西人民出版社

钟明荣 著

中国 通货膨胀 研究

中青年学者
论著丛书



中国通货膨胀研究

钟朋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部系统研究当代中国
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专著。书中
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与现状，
通货膨胀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
通货膨胀的基层与深层原因、分
配效应、产出效应等，进行了论
证与分析，并从加强信贷约束的
角度，提出了治理通货膨胀的思
路。

中青年学者论著丛书
中国通货膨胀研究

钟朋荣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375 字数23.5万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30

ISBN 7—210—00653—2/F·59 定价：4.30元

钟朋荣



钟朋荣

一九五四年生于湖北浠水，
一九七九年毕业于湖北省外贸学校，毕业
后留校任教，
一九八五年考取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
研究生，一九
八八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现在中共中央
办公厅调研室工作。

自一九七九年起，钟朋荣在《中国经
济》问题、《学术月刊》、《江汉论坛》、《人
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
刊先后发表学术论文一百余篇，约七十万
字，内容涉及《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
原理、物价、金融、税收、外贸、投资等若
干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的学术见解。作
者曾与他人合著四本著作，本书是他单独
写作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目 录

总 论 篇

第一章 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与现状	2
1·1 旧中国的战时通货膨胀	2
1·2 建国初期历史遗留的通货膨胀	7
1·3 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通货膨胀	8
1·4 “文化大革命”期间抑制型的通货膨胀	10
1·5 1979年开始由价格调整引起的通货膨胀	11
1·6 1984年开始由工作失误和双重体制造成的通货膨胀	14
1·7 社会主义时期四次通货膨胀的比较	16
第二章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关系	20
2·1 两种通货膨胀定义	20
2·2 通货膨胀的种种起因	24
2·3 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因果关系	26
2·4 通货膨胀推动物价上涨的过程	30
2·5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时滞	34
2·6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速度差异	40
2·7 通货膨胀的三种形态	42
第三章 通货膨胀的观测	45
3·1 商品与货币的外延	45
3·2 商品交易量的测算	48

2 目录

3·3 货币总流量的测算	51
3·4 货币流通速度的正常延缓与被迫延缓	53
3·5 价格管制条件下通货膨胀的两种观测方法	58
3·6 作为观测通货膨胀的物价指数	61

归 因 篇

第四章 西方通货膨胀归因论	66
4·1 古典需求膨胀论与现代需求膨胀论	66
4·2 工资推进的通货膨胀论	72
4·3 需求移动说与结构性通货膨胀论	76
4·4 垄断在通货膨胀中的作用	79
4·5 结构主义的通货膨胀模型	83
第五章 我国学者对涨价原因的诊断	87
5·1 非货币因素说	87
5·2 农业资金转移说	91
5·3 投资膨胀说	92
5·4 成本推动说	95
5·5 结构调整说	98
5·6 供给不足论	101
第六章 我国通货膨胀的体制原因	105
6·1 就业体制与工资膨胀	105
6·2 投资体制与无效投资膨胀	108
6·3 集团消费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11
6·4 价格双轨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112
第七章 通货膨胀与信贷资金软约束	116
7·1 通货膨胀与信贷膨胀	116

7·2 信贷供给中的倒逼机制	120
7·3 信贷资金对企业的软约束	124
7·4 信贷资金对地方政府的软约束	128
7·5 信贷资金对专业银行的软约束	129
7·6 信贷资金对中央财政的软约束	133
7·7 信贷资金对中央银行的软约束	134

效 应 篇

第八章 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	138
8·1 货币与产出的一般关系	1 8
8·2 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增长的理论依据	141
8·3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关系	144
8·4 通货膨胀对闲置资源的利用	149
8·5 通货膨胀的积累功能	153
8·6 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短期刺激作用	156
8·7 通货膨胀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159
8·8 对两个理论问题的分析	160
第九章 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	167
9·1 债务人对债权人利益的无偿占有	167
9·2 出口方与进口方的收入转移	172
9·3 “鬼影”利润与资金短缺	175
9·4 两种分配不公的同时加剧	179
9·5 财政：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182
9·6 抑制型通货膨胀的分配效应	186

对 策 篇

第十章 经济学家的药方	192
--------------------	-----

4 目录

10·1 降低货币增长率	192
10·2 放开或调高利率	196
10·3 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200
10·4 货币发行自由化	206
10·5 恢复金本位制	208
10·6 用通货膨胀医治通货膨胀	210
10·7 降低税率刺激供给	212
10·8 工资管制	214
10·9 物价管制	215
第十一章 对摆脱困境的探索	217
11·1 货币供给系统：第一道闸门的建立	218
11·2 货币供给系统：第二道闸门的建立	224
11·3 货币需求系统：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	231
第十二章 通货膨胀下的收入补偿	235
12·1 并非所有的涨价都要进行收入补偿	235
12·2 四种补偿方法比较	237
12·3 暗挂：转轨时期的补偿方法	244
12·4 指数化：收入补偿的目标模式	246
12·5 与物价挂钩的收入项目	249
12·6 用于挂钩的价格指数	253
12·7 收入存量的补偿	256
12·8 收入补偿的时滞	258
12·9 收入补偿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260
第十三章 通货膨胀下的会计对策	262
13·1 币值不变与币值下降：原则与现实的矛盾	262
13·2 不变币值会计与现行成本会计	265

目录 5

13·3 两种通货膨胀会计模式比较	280
13·4 当前的对策	286
后 记	289
主要参考文献	

总 论 篇

第一章

中国通货膨胀的历史与现状

本世纪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通货膨胀。这几次通货膨胀产生的历史条件、原因、程度和影响极为不同。回顾和比较这几次通货膨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提高我们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能力。

1·1 旧中国的战时通货膨胀

1935年以前，中国是一个银本位国家。在银元流通条件下，虽然也有物价的变化，但这主要是商品和货币的价值及其对比关系变化的结果。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法币改革，其主要内容是：（1）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具有无限法偿能力的货币；（2）禁止白银流通，将白银收归国有，充作外汇准备金；（3）法币的汇价规定为一元等于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并由中、中、交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法币是一种不兑现的纸币。法币制度的推行，不仅为国民党

政府推行通货膨胀政策铺平了道路，同时也成为中国三四十年代连续14年通货膨胀的起点。据统计，自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的20个月中，法币发行额从4.57亿元增至14.07亿元，增加了2.08倍。同期物价水平上升34.03%。这就是说，在抗日战争以前，法币的通货膨胀就已发生。

抗战初期，人们对法币尚未失去信任，加上战争的爆发，人们为日后生存也需要储藏货币，于是便把法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储藏。即使在沦陷区，“法币虽被日伪禁止使用”，“但沦陷区域人民窖藏法币已成普遍现象”。^①这就使法币持有系数上升，法币流通速度延缓，扩大了市场对法币流通量的需要。加上1937年至1939年间，后方粮食收成好于往年，因此，抗战初期通货膨胀的速度比较慢，且物价上涨的速度慢于货币增长的速度。若以1937年6月的法币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为1，则1939年12月法币的发行指数为3.04，增长204%，而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77，增长77%。

自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至1939年的4年中，虽然有通货膨胀的存在，但这时的通货膨胀是一种温和的通货膨胀。1939年是由温和通货膨胀向恶性通货膨胀转变的转折点。这一年虽然在重庆等地的物价指数并不高，但由于这一年的法币发行额由上年的23.1亿元增加到42.9亿元，增长83.19%，成为1940年物价大幅度上涨的直接原因。此外，随着货币发行额的大量增加和物价上涨，人们开始认识到储藏货币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于是，开始由储币转为购买，这就导致1940年以后物价上涨速度快于货币增长速度。仍以1937年6月的指数为1，1940年12月的货币发行指数为5.58，比上年同期增长2.54；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为10.94，比上年同期增长9.14，物价上涨率相当于同期货币增长率的3倍多。

从1942年7月1日起，国民党政府为了更便于推行通货膨胀政

^①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财政评论社1943年版，第65、66页。

策，把法币的发行权由原来的三家银行集中到中央银行。这样，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法币的发行额达到5569亿元，相当于1937年6月货币发行量的395倍；同期重庆的物价指数相当于1937年6月的1795倍，上海的物价指数相当于1937年6月的8.64万倍。

法币的恶性膨胀虽然与抗战有一定联系，但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政府发展反共武装和积累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侵华日军和伪军的主要部分为解放区军民所抗击，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实行反共政策，发展了约四五百万人的武装力量。军事支出和主要用于军事和特务开支的特别支出，由1937年的13.8756亿元增加到1945年的9106.8472亿元，增长656倍。这两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1937年的66.35%上升到1945年的71.33%。由于军事费用的大量增加，财政收支难以平衡，财政赤字由1937年的15.3243亿元增加到1945年1至10月的6853.6717亿元，增长447倍。弥补赤字的途径就是增加货币投放。所以，法币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战争，其中既包括国民党的抗日战争，也包括国民党的反共内战。

官僚资本的发展是法币迅速膨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25年底，全国官营工业资本只有3019.7729万元，到1941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官营工业资本增加到8亿元。官营资本的发展，一是靠财政拨款，二是靠银行贷款。据统计，预算中所谓建设费用，8年平均占21.92%。为了扶持官僚资本，四行二局（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信托储金局、邮政局）到1945年为止，放款余额达14131亿元，比存款6188亿元多出7943亿元。这些贷款80%至90%都用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与国民党政府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同时，在各沦陷区，广大中国人民也深受日、伪的通货膨胀之苦。

——在东北，伪满中央银行1932年6月开业时发行伪币1.5亿元，此后每年都迅速增加，到1945年7月，货币发行量增加到80亿元，相当于1932年的53倍。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前夕，市场商

品暗中交易的价格，有的达到公定价格的3000倍。

——在台湾，日本帝国主义也极力推行通货膨胀。1937年7月，台湾银行券的发行额为7500万元，到1945年7月，增至14亿元，到该年10月中国正式接管时，又突增到28.98亿元。8年间，台北市的物价上涨了23倍。

——在华北沦陷区，1938年3月成立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流通于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当时发行²071.2万元，到1945年10月被接收时，增至1951.02897116亿元，相当于1938年3月的9420倍。

——在察哈尔、绥远及内蒙一带，日伪设立的蒙疆银行截至抗战胜利时，共发行伪蒙疆券35.2921871亿元。

——在华中地区，汪精卫政府于1941年1月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中储券流通于江苏、浙江、安徽、上海一带。¹941年1月发行1317.901万元，1945年8月增加到46618.473518亿元。物价指数1945年8月比1942年1月上升约5000倍。

总之，在8年抗战期间，中国人民既受国民党政府法币膨胀的剥削，又受日伪纸币膨胀的剥削。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伪币的通货膨胀不复存在，但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但没有遏制或缓和，而且日益加剧。

日伪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用法币兑换了沦陷区的各种伪币。兑换之后，上海等地的物价出现了短期下降。随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继续滥发纸币，积极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物价又迅速上升。从1945年8月至1948年8月，法币的发行量由5569亿元增加到6636944亿元，3年内法币发行量增加1206倍，物价上涨1.4万倍。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在东北大量发行东北流通券，从1946年1月至1948年7月，流通券发行量由13亿元增加到320860亿元，共增加24681倍，比法币增加得更快。沈阳市的物价指数1948年8月为1946年1月的15190倍。

在法币崩溃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于1948年8月19日实行了币制改革，用金圆券代替法币。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1）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量为纯金0.22217公分；（2）按1：300万的比率收兑法币，收兑后法币停止流通；（3）私人不能持有黄金及外币，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并登记人们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4）金圆券的发行采取十足准备制，发行准备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发行额以20亿元为限；（5）物价冻结于1948年8月19日的水平。

在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时，其政权已经摇摇欲坠。它所宣布的币制改革方案只不过是用来欺骗群众，以便从群众手中掠夺大量黄金、白银和外汇。实际上，金圆券的发行量比法币膨胀得更为迅速。1948年8月20日，金圆券发行2亿元，到同年11月9日就增加到19亿元。金圆券的迅速增加，特别是由于解放军在淮海战役和辽沈战役的胜利，首先是上海，随后是全国各地掀起了抢购风潮。人们“见物即买，尽量将金圆券花去，深恐一夜之间，币值大跌致受损失”。上海的一些大商店“开门后潮涌而入，满架货物，倾刻搬空”，天津“百分之九十九的货架都空空如也”。在抢购风潮的冲击下，蒋介石“借人头平物价”也无济于事，不得不于11月1日宣布取消限价，11月12日将金圆券公开贬值80%，并取消金圆券的发行限额。限额取消后，当月的金圆券发行量即增为33.94亿元，12月增为83.2亿元，1949年4月增加到51612.4亿元。从1948年8月至1949年5月，金圆券发行量增长307124.3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6441361.5倍。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城市的交易都以黄金、美元或银元标价，农村则盛行物物交换。

抗战以前以及抗战期间，我国境内存在着三种政治力量，相应地也就存在三种货币。在法币和日伪货币恶性膨胀的同时，解放区也曾经发生过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

抗战以前，革命根据地的货币基本是稳定的。据统计，各根

据地到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止，共发行29种纸币。1933年以前，由于纸币的发行坚持了“基本上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一原则，加上工农银行备有充分的银元，保证纸币的随时兑现，因此，“苏维埃钞票，境内畅通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①。1933年以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破坏，根据地财政来源十分困难，以致不能维持兑现，货币流通状况恶化。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地货币流通状况又开始好转。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曾写道：“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②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都设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虽然各银行坚持稳定通货的方针，尽可能减少财政发行，但由于日伪货币和法币的干扰，也由于增加战争经费的需要，抗日根据地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不过，抗日根据地的通货膨胀程度比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要低得多。例如，晋冀鲁豫解放区在1940年至1945年物价上涨26倍，而同期国民党统治的重庆物价上涨460倍，沦陷区的上海物价上涨7000多倍；1945年至1948年，晋冀鲁豫解放区物价上涨23倍，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物价上涨了几十万倍。

1·2 建国初期历史遗留的通货膨胀

建国前夕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多年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政府不得不

^①当时苏区刊物《斗争报》第66期关于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情况的报道。

^②斯诺：《西行漫记》第204页。

靠发行货币来支持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此外，国民党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尚未消除，又加上不法商人乘机兴风作浪，造成全国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天津、北京解放之后，发生了1949年4月至5月的大涨价，波及到华北、华中、山东等地。天津综合物价指数5月中旬比3月上涨1.2倍。同年7月，以上海为中心又出现一次涨价高潮。其间上海批发物价指数上升153.6%，且波及华北、华中等地。同年11月的物价上涨，其幅度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自10月11日到11月25日，全国各大城市物价均上涨3至4倍。1950年2月，涨价风潮又在上升。这次涨价主要涉及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3月份，全国15个大城市25种批发物价指数比1月份上升将近1倍。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11月，全国13个大城市批发物价指数上涨了52.76倍。由于人民政府采取了发行公债，整顿税收，集中调运和抛售物资，打击投机商人等一系列稳定金融物价的措施，每次涨价风潮持续时间较短。1950年3月，随着统一财政经济工作的实行，财政赤字大大减少，物价逐渐趋于稳定。

1·3 1958年“大跃进”引起的通货膨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由于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要使我国主要工业品产量赶上或超过英国；同年8月北戴河会议提出，将钢的产量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为此提出“以钢为纲”，全民动员，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在运动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左”倾错误。为实现“大跃进”，商业